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语境与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

郭贵春 著

科学出版社



语境与后现代科学 哲学的发展

郭贵春 著

本书受“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基金资助

科学出版社

2002

内 容 简 介

本书立足于20世纪科学哲学“三大转向”的历史背景,从理论上宏观地解释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去向,阐释了语境论及语用分析的理性选择。为了更清晰地透视这幅波澜壮阔的画面,从实例上微观地对三位著名的哲学家,即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和范·弗拉森,作了详尽的分析。通过这些内在分析,进一步说明了后现代性与科学哲学的紧密联系,从而对后现代科学理性与科学民主的统一给出一种历史性的描述。

本书适于大学哲学系师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境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郭贵春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ISBN 7-03-010413-7

I. 语… II. 郭… III. 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
研究 IV. 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8786号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2年5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0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1/2

印数: 1-1 500 字数: 249 500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双青>)

目 录

绪论 语境与后现代科学哲学	(1)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实在论	(1)
第二节 迷人的“语境”与科学哲学的发展	(9)
第一章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演变	(11)
第一节 科学哲学在“转向”中运动	(11)
第二节 “语言学转向”的哲学本质	(16)
第三节 语义学的哲学本质	(24)
第四节 修辞学的哲学本质	(34)
第五节 论心理意向的后现代重建	(43)
第二章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语境分析	(53)
第一节 语境分析的方法论意义	(53)
第二节 测量的语境分析	(61)
第三节 测量语境的特征	(72)
第四节 D. 玻姆思想中的语境观	(82)
第三章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语用分析	(91)
第一节 语用分析的方法论意义	(91)
第二节 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	(100)
第四章 维特根斯坦与后现代性	(111)
第一节 维特根斯坦与后现代反本质主义	(111)
第二节 维特根斯坦与后现代解释学理论	(119)
第五章 伽达默尔与语境论	(129)
第一节 伽达默尔的理解语境观	(129)
第二节 伽达默尔的真理语境观	(137)
第三节 伽达默尔的语言语境观	(145)
第六章 范·弗拉森与后现代反实在论	(154)
第一节 范·弗拉森后现代反实在论演变的总体特征	(154)
第二节 范·弗拉森后现代反实在论的方法论演变	(163)
第三节 范·弗拉森反实在论真理观的后现代走向	(171)
后记 科学理性与科学民主的统一	(182)
参考文献	(184)

绪论 语境与后现代科学哲学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实在论

站在世纪之交人类理性思维演进的历史基点上看,20世纪后现代主义思潮与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渗透和融合的互动生长态势。一方面,后现代主义通过具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实质的“后现代性”,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的手段,冲击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给传统的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可接受性带来巨大的震撼,并渗入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促成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诞生;另一方面,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又在其生成、演化和发展中,从动态性、相对性和整体性的结合上具体生动地展示了后现代理论的特征。因此,系统地阐释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实在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把握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动因、特征和意义,揭示在科学实在论研究中的“后现代趋向”的本质,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

一、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现存性

后现代主义所彪炳的后现代性席卷了西方哲学的所有领域,因此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作为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研究中的渗入是现实地存在着的,它是在对现代性的反叛中,所显示出来的一系列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趋向性。可以说,没有这种趋向性就没有后现代科学实在论。

1. 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

一般地讲,人们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一词去描述文化领域中的后现代运动及其现象,以区别于现代主义运动、本文和实践;而用“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一词去描述伴随后现代运动而呈现的一切可标榜的后现代性特征。

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后现代理论，或者一致的一组立场。后现代理论的繁杂性和立场的多元性，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基本原因。所以，“后现代”概念本身只是表明了一种文化、社会、政治和哲学等等发展的历史趋向性，而不是任何一个确定不变的理论。但是，当后现代主义在对历史作出嘲弄式的批判或否弃的形式下，试图去重新定位当代文化的走向和基点时，它们也自然地构成了一种影响科学自身发展的特定人文环境或人文途径。从这一相关性上讲，后现代主义运动至少体现了以下几点后现代性特征：

(1)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要向所有相互对立的理论、范式和学派都共同遵循的某种元科学纲领挑战。它批判了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本身是一个具有特权的理由形式或真理媒介的观念；反对惟有科学知识可以被安全地建构的科学主张；驳斥了现代主义坚持科学理论具有保证科学研究概念基础作用的思想；否弃了现代主义以为科学是或者应该是价值中性的立场；强调了科学的实践的和道德的意义；展开了一致性地建构科学真理的信仰的争端。一句话，“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它批判了认为科学认识是普遍的，因而它能够通过非语境的方式予以证实的主张”。^[1]从而擎着“反对科学主义”的旗帜，在批判现代主义中，重新构置科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以及科学、本文和叙述之间的联结。

(2)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文化经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高科技的应用、传输媒介的爆炸式发展、政治形式的变换、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新的时空经验的感受以及社会主体性的突出等等，这一切促使后现代主义在科学上导向一种新的文化经验，并以此来对抗那些元理论的理性经验。其本质在于，它把社会看作是由无限多的生成意义的文化载体所构成的。在这种新的文化经验框架内，一切都是相对地自主的和自足的，都服从于它们各自的独特轨迹，都有其自身的真理的有效性条件，其典型的口号就是“真理的标准是依赖于语境的”。^[1]

(3)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后现代主义抱着怀疑和嫉世如仇的态度去看待世界和本文，其目的并不在于获得最大限度的清晰和摧毁；在于有意识地去“错解”或“错读”，而不是理性地建构和逻辑地抽取；并不诉诸任何权威，而是玩那些“当我们烦恼时可以改变其规则”的游戏，“其信条就是：别对任何事情太认真，这不值得烦恼”。^[2]因而，它试图破除所有已确立的科学学科之间的边界，去讲说超学科的论述，并让表达、真理、理性、体系、基础、确定性、因果性和意义等概念，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嘲讽中消失。而其根本性战略目的，则蕴存于摧毁、解构、取代、破坏、区别、断裂、消除、分解、不确定、非中心化、非神秘化、非整体化及非正统化等等这一系列批判性的概念之中。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一切形式和内容、动机和目的、手段和途径，都需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去实施和实现。正是这一战略，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本身。

不言而喻，从后现代特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把“反科学主义”作为其反传统的一面旗帜，把“新的文化经验”作为反基础主义的一只号角，把“解构战略”作为反本质主义的一场冲锋。在这里面所蕴含着的反理性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趋向，不能不作为普遍的后现代性本质影响“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

2. 后现代性与科学实在论的选择

后现代运动的激流冲击了所有哲学的城堡，形形色色的哲学家、哲学派别或集团无论是批判、反对、顺应或修正这一潮流，均从自身的利益和前途做出了敏锐的反应，为自己的哲学立场重新定位，选择新的发展趋向。

从这一视角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由朦胧到鲜明，由狭小到广大，是科学实在论发展的时代要求，是一大批科学实在论者身处“后现代”的思潮中反叛“现代”的结局，它具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比如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图景论与内在论的意义论的结合，把科学实在论的立场由“本体论的约定”推向了“意向关联性的扩张”，从而把语义分析导向了语言的意向结构的深层揭示，代表了后现代性的一种趋势。

但是，科学实在论对后现代性趋向的选择仅仅是“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中的映射或影响，它并不等同于后现代文化或艺术中的任何特殊的人文主义流派。同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也绝非任何单纯的、抽象的允诺，而是具体地和内在地渗透于科学的理论、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中。在这个意义上，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理解应是多形态的、多层次的和多视角的。这就在于：

（1）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理解不能过于狭窄，否则将会抹杀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多样的趋向性及其真实的意义，也将失去把握它的“后现代性”跳动的脉搏。在这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存在性，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某种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而在于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中，它是否产生或具有某种渗透着“后现代性”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换、趋向的调整或认识论基点的重新定位。

（2）从本质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或方法论趋向，它的存在性恰恰在于这些倾向或趋向之中，所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一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战略”，而不是任何固定不变的教条或模式；提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概念，正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当代科学实在论进步的某些时代的特征，而不是其他。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就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深化”，而是可感知的“现实”了。

（3）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所不同的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仍然高举着科学理性的旗帜，把坚持、弘扬和发展科学理性作为其奋斗的宗旨。它的后现代性

仅仅在于，弱化规范理性对科学活动的强约束，延展科学理性运动的疆域，开拓实现科学理性的方法，在科学主义的精神中引入人文主义的精神，把科学的社会化和科学化的科学看作是一致的，从而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推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趋势。所以，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中的表现是曲折的、非直观的和深层的，但这正好表明了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研究中的时代性、必然性和深刻性。

总之，我们不能用后现代性来否定科学实在论，也不能用科学实在论来简单地代替后现代性。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者们讳言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绝对消除不了在他们理论中所渗入的后现代性的研究趋向。

二、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实在论的转向

在后现代主义运动中，尽管派别林立、观点繁杂、思想多变，但从对科学实在论的影响上，却是有形的、具体的和生动的。正是这些具体的基本理论的不断渗入，激发了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转向。

1. 后现代主义的两种基本趋势

后现代主义运动中存在两种基本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倾向或趋势。一是以莱奥塔德（Lyotard）为代表的局域论的趋势，强调世界已被破碎成了局域的、自主性的世界，试图发展被称之为后现代条件的“莱奥塔德描述”。二是以德里达（Derrida）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趋势，强调后结构主义的因素贯注于后现代的意义难题，从而产生了一种将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和不可靠的观念立场。这两种趋势均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转向产生了潜在的和间接的影响。

首先，消解和摧毁元论述的神圣性及其尊贵地位是局域论趋势的根本宗旨。莱奥塔德对后现代主义趋势的途径做了这样的描述：“对于语言游戏的非同质本质的认可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确定一个游戏规则的任何一致性和在其中可行走的步骤必须是局域的……因而，这一趋势倾向于有限的无论证的多样性，并且这种论证涉及其在时空中的限制。”^[3]这也就是说，后现代世界被看作是破碎成诸多孤立世界的世界，它是在不能由任何基本的元论述所统一起来的局域论述的多元性中，各种要素的随机组合。

因此，局域论的趋势反对用元论述去统一一局域论述；强调案例分析而不顾基本的理论背景和系统的建构；不注重对一般特征的沉思，而突出对结构和组织形态（科学、文化、社会建制等）之间的相互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元的论述以特殊方式存在着与科学的联结，而科学以多重层面与社会相互作用，以至于不存在孤立的科学哲学的领域，人们对于科学哲学之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及心理的分析，

不应再受到狭隘科学哲学的歧视。

其次，解构和放弃逻辑及任何本文的规则是后结构主义趋势的核心目的。局域论趋势是要把意义难题由普遍引向局部，是要在一个确定的社会、文化或科学的局域内，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去使用局域的语词并求解局域的语言游戏，以达到对意义难题的解决。而后结构主义的趋势则认为，限制意义及其有效性的范围，并不能使对意义的把握更容易或更可能；应当把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不可及的或不可把握的。总之，使意义明显地通过结构的消解展示出来，而不是隐含于结构的神秘现象之中，正是后结构主义的途径。

由此，后结构主义趋势认为本文是我们能够接触的惟一实在，我们没有进入世界自身的途径，本文构成了我们的世界的界限。谈论世界等于谈论本文。由于本文（世界）决不可能是一致的或符合的，在本文内在的意向性与各种表达形式之间就存在着特有的分离张力，任一本文都背叛其自身而期望使这种分裂潜势获得自由。所以，后结构主义的焦点就聚集到了关于本文的分裂效果上。正是这种分裂效果表明，由于不存在先验的表征，意义永远不能被完全地把握；这正像摹写和延续是无止境的，因而不存在我们能够移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一样。

2. 科学实在论后现代趋向的两个必然阶段

后现代主义的这两种趋势从不同的侧面对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影响。从而使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科学哲学整体发展中的“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密切相关。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统治”的衰退而开始的科学实在论的复兴运动，恰是与科学实在论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在趋向上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这两个转向相关，已经历了两个自然而又必然的阶段。

其一，“解释学转向”促进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孕育和生长。事实上，伴随着20世纪“语言转向”的洪流，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超脱传统基础主义的窠臼。当它期望将科学理性的重建莫立在“不可置疑的感觉材料”的基础上时，只不过是从事语言分析的形式上将基础主义极端化了。“解释学转向”作为对“语言学转向”的反叛，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主义的分析，反对根据科学主义的教条去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绝对划界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运动中产生的范式转换、新的理解和阅读本文的方式，标志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出现。特别是促进了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科学技术与人类知识的社会化等等之间的结构统一性和意义的一致性。因而，许多科学实在论者选择了知识整体化和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取向，强化了科学实在论与社会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相互融合的研究趋势。“解释学转向”深刻地表明，由逻辑经验主义“统治”的衰退而逐渐全面展开的科学实在论的“复兴时期”，已经历史地结束；一个将从结构、功能和意

义上,对整个西方科学哲学的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后现代发展时期”,已经自然而又必然地开始。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实在论“全面复兴”的完成和逐步走向后现代发展的趋势是一体化的。

其二,“修辞学转向”推动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显著发展。“修辞学转向”的实质是要把科学修辞作为一种确定的研究方法,充分地揭示科学论述的修辞学特征,从而更进一步地跳出形式语言的逻辑预设,而从科学论述的境遇、选择、分析、操作、发明和演讲中,给出战略性的心理定向和更广阔的语言创造的可能空间。这一“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兴起,促进了科学实在论更进一步地排除在理性和非理性、语言的形式结构和心理的意向结构、逻辑的证明力与论述的说服力、静态的规范标准和动态的交流评价之间的僵化界限,进一步削弱单纯本体论的独断性,强调心理重建与语言重建的统一。这深刻地表明,科学实在论在已经相当进步了的基底上,正在不断地充实和实现自身的后现代性,特别是在研究的视界上,正在更自觉地由外在走向内在,由宏观走向微观,由粗犷走向细腻,由狭隘走向广阔,显示了科学实在论自身所具有的创造性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科学实在论在反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表征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英美哲学和大陆哲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向。

不言而喻,在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生成和发展中,其后现代性趋向表明:在理论上,不断地由单一转向多元,由绝对转向相对,由对应论转向整体论;在实践上,由逻辑转向社会,由概念转向叙述,由语形转向语用;在方法上,由形式分析转向了对语义分析、解释分析、修辞分析、社会分析、案例分析及心理意向分析等等的具体引入。总之,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趋向具有着对象的、层面的、视角的和意义的不同,表现了各种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观念区别,反映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运动所具有的多样性和过程性的统一。

三、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趋向特征

从本质上讲,后现代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方法论的分析,而是反对将任何一种方法看作是凌驾于其他方法之上的具有特权的圣物。后现代主义也不一般地反对整体论的分析运动,而是反对在任一统一的科学纲领下的总体理论的探究。这种以综合和消解为中心的方法和手段的集合,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战略。它的具体实现途径体现为:①“差异”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前提,它是要将元理论的分析还原到最小的或最局域的单元,在非中心化的世界中去寻找“差异”的中心性,在解构了的世界中去寻找解构的实在性,在分裂了的本文中去寻找肢解的实质性,所以,本文的意义不在于它自身内在的本质,而是“差异”;②“讽刺”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基础,它使得实在和语言之间的一致及其不可言说的游离,成为后现代主义理

论的对象、边界、条件和途径，由此，讽刺手法所引出的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词本体论这一后现代解构战略的基础；③“放弃独白、构造对话”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根本途径。“独白”作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元理论的表现形式，使论述丧失了“实践-道德”的本性，也造成了社会意义的模糊性，所以，只有构造对话，才能从元语言走向自然语言，从元理论走向修辞发明，从元逻辑走向社会结构，从元规则走向普遍的价值。^[4]这种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具体实现途径，渗透或折射进了当代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之中。这种渗透或折射是以不破坏科学实在论的总体目标、趋向和本质条件，以拓展科学实在论研究的空间、手段和深度为要求，以强化科学实在论自身所特具的学科性、表述性和语词性为特点的。它们不是以囿囿的东西被对应地搁置于科学实在论的框架之内，而是作为一种活的人类理智的要素被有机地消化、吸收和融入于科学实在论独特的有机体中。在这样一种时代的背景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体现了如下的趋向特征：

1. 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

整体论的扩张是对传统实在论过分强调“普遍论”的现代性的反叛或修正，是要把个体的整体论和自主性与整体的个体性和相关性结合起来，去说明科学运动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所以，整体性的扩张就在于开放性的选择。它强化科学解释学的实践性，把人类的行为、科学和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大”本文来阅读，使科学认识论的语言具有整体的丰富性、深邃性和时代性的特征。同时，它引入修辞学的方法，把科学论述看作是符号化的劝导，而不是单纯的形式表征；看作是境遇论述，而不是纯粹的逻辑规则的推演；看作是与特定共同体相关的讲演论述，而不是简单个体经验的实现；看作是有理由的论述，而不是预设先验标准的理性的概念化；看作是创造性的发明论述，而不是证明或说明模式的惟一结构。另外，它通过自然主义的途径去说明科学理论的规范的形式系统与经验的描述系统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从而对理论语言进行泛物理主义的阐释，或者通过科学的进化去说明科学的“内在”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阐释理论、仪器、方法、价值、规范、道德、心理和社会建制等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而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本质上的社会活动。意义理论的深入是对传统实在论机械理解“语词-世界”关系的现代性的否弃和超越，是要把意义的真理性和真理的意义性统一起来，去阐释科学运动的表征方式和解释方式。它用“意义大于指称”的观念去消解传统的对应论的指称论，从而坚持了“意义”的意义超越了直指的旧观念，实现了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

2.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限制了在语

言框架中对“实在”或“存在”之类语词的纯形而上学的断言，而后者则更多地诉诸语言与世界之间的一致性关联；前者试图消解对应论，而后者则在符合论的基础上去探究理论实体的对应指称；前者强调的是内在的可接受性，而后者注重的是对应的趋同性。随着解释学、修辞学以及语用学等方法的引入，在方法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相渗透和融合的基底。正像“弱”实在论更趋向于后现代性，而“强”实在论更趋向于现代性一样；“弱”反实在论更趋向于后现代性，而“强”反实在论更趋向于现代性，它们在后现代的意义上“走到了一起”。所以，E. 麦克姆林 (E. McMullin) 深有体会地讲：“反实在论在语调上是反实在论的，但他们的立场却常常与科学实在论的大部分基本立场相一致……这就给出一种弱的反实在论的立场。”^[5]换句话说，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中的渗透，使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之间的论争变得更加微妙，特别是“弱”实在论与“弱”反实在论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因此，有人甚至认为“范·弗拉森的构造经验论实际上是一种实在论的形式，而他的科学事实上是一种经验论的形式”。^[6]这种反对在本体论上无限制地后退或还原，而主张一种相对的、有限的可还原性，使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他们之间谈话的同一基础。他们都可以在经验实在、语言实在或语境实在的前提下去进行对话，而将本体论的追寻暂且“悬搁”起来。可见，从绝对本体论的承诺走向相对本体论的分析，从绝对的基础走向相对的前提，从标签式的阵营分类走向可通约的方法论差异，即从对绝对性的解构或消解去把握相对的一致性，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走向的必然。

3. 语义分析方法的全面展开和语用分析方法的系统运用

在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中，语义分析方法已作为一种横断的研究方法，“像血管和神经一样渗透于几乎所有的理论的构造、阐释和说明之中”。^[7]可以说，“没有语义分析就没有科学实在论”。特别是它所具有的那种统一整个科学知识和理性的功能，使得实在论者们将本体论与认识论、想象世界与可能世界、直观经验与模型重建、指称概念与实在意义，在语义分析的过程中内在地联成一体，形成了把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视角。随着科学实在论后现代趋向的不断深入，在方法论上发生了从对语形的经验语义分析到对语用的语境分析的转变。从本质上讲，这种语用语境“是由一致性所构成的命题集合……，是一个复杂的事件”。^[8]作为一个命题集，它有着相关的事件基础，存在着深层的隐喻和心理的、行为的、社会的基底；而作为一个事件，它又有着赖以表达的命题集，存在着一致性的表达和记录。因此，对实在的相关特性的表达和选择，是语言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背景选择，只有通过建基于语境之上的语用分析才能得以实现。^[9]这表明了在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结合上去消解形而上学的断言，确定科学理论术语的语义空间和逻辑空间，去描述概念的语义网络，说明它的语义的一致性和语用意义的整体性的后现代要求。对后现代科学

实在论来说，语义和语用分析已由被迫的论战需求转化为容纳和满足各种实在论的立场、观点和可能趋向的方法论的保证形式。

我们看到，尽管后现代如日中天的辉煌时期已经消逝，但后现代主义浪潮并未完全退去，它对人类理智运动所产生的那些时代性影响，将会继续发生它潜在正负方向的效应。从与科学实在论相关的视角上看，它导致了如下倾向：①极端的相对主义。将叙述与科学认识割裂开来，使任何事件都自主地运行，完全是一局没有规则的游戏。②具有某种古代诡辩论的特征，对哲学理性进行嘲讽和亵渎。③反实在论的立场。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衰落并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除了其理论的歧误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科学所具有的两个时代特征：其一，无论当代文化的发展多么的斑斓多彩，科学均将处于文化运动的主流之中；其二，科学建制的系统化、完备化和开放化，已使它不断地增长了与社会建制之间的联结，并由此产生了更强有力的社会力。而后现代实在论正是从这两个基点出发，通过整体论的扩张、意义理论的深入以及语用分析方法的引入，不断地走向了“开放”、“弱化”和“建构”这三个最基本的趋向性上。这既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具有的“后现代性”的时代特征，又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途径。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各种弊病及其有意义的前景，均体现在这些趋向的统一之中。

当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需要我们加以分析和批判的缺陷，尤其是内在化的和片面自然主义的趋向。但是，从总体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在吸收“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去消解传统实在论的价值标准时，并没有陷入一般的现代主义的极端的相对主义；在与反实在论的论争中，在借鉴语义和语用分析及意义批判的手段时，也没有导向狭隘的解构主义；在接受解释学、修辞学的方法及与人文主义的相互融合中，也从未放弃对于科学理性的追求。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所显示的这些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富有时代意义的趋向是不言而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喻示我们，在当今中国文坛上“泛文化主义”盛行之时，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高举“五四”以来的“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一项多么必要、必然而又必需的事业。

第二节 迷人的“语境”与科学哲学的发展

当我们面对 21 世纪，回眸 20 世纪科学哲学的历程时就会发现，在哲学运动的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及修辞学转向的过程中，科学哲学的进步有着两个极其鲜明的特征：其一，它所提出、求解和涉及的一系列理论难题，均在一定意义上与语境问题本质地相关，即试图从不同的语境视角去重构或重解这些难题；其二，通过“再语境化”的途径，以朝向后现代性发展的趋势，抛弃一切单纯形式的、经验的、范式的或框架的依托，而转向将所有科学之历史的、社会的、语言的和心理的层面

统一到一个不可还原的、整体的语境基点上去。由这两个特征所形成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已经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跨入 21 世纪哲学运动的大门。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科学哲学的这一趋向绝不是偶然的。它是语言转向、解释转向及修辞转向相互演化、更迭、渗透与综合的必然的逻辑结果。始终作为科学哲学运动之灵魂的科学批判精神，并没有将自己禁锢在狭隘的形式理性的教条之中，它在自身的运动中消解了把哲学研究仅仅引向经验基底上的句法层面，过分突出形式理性与科学主义的观念；弱化了将语言经验与解释经验、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相互融合的社会化的非理性主义的倾向；意识到了语言分析的本质在科学哲学广义自然化趋向中所具有的“战略研究”的地位、作用及其不足。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哲学的研究从“语用语境”的基点出发，修正“三大转向”所具有的缺陷，从而在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结合上去探究科学哲学未来发展的新趋向，就是自然而然而又必然的了。

可见，把语境作为语形、语义和语用结合的基础，从语境的基底上去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当然，这一回答与语境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本质是分不开的。这就在于：①语境是一种具有本体论性的实在。正像所有实体的存在都是在相互关联中表达的一样，语境作为一种实体是在诸多语境因素及其相互关联中获得实现的，并由此构成了整个哲学理论分析的十分“经济”的基础。②语境是在一切人类行为和思维活动中最具普遍性的存在。“一切都在语境之内”。因为一旦消解了语境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的僵化界限，一切认识对象便都容纳于语境化的疆域之内，并在其中实现它们现实的具体意义。同时，“所有语境都是平等的”。因为语境本身并不具有任何超时空的特权或权势，因而科学的平等对话的权利更有益于人们去面对科学真理的探索及其富有规律性的发展。③语境作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基底具有着方法论的横断性。在一切科学研究中，证据绝不等同于方法，而方法必然要超越一切特殊证据的背景要求的狭隘性。因而对所有特殊证据的评判只有在语境的横断性的方法论展开中，才能获得它更广阔的意义和功用。在这里，语境在某种意义上的超验性与它的方法论的横断性是一致的。④语境绝非一个单纯的、孤立的实体，而是一个具有复杂内在结构性的系统整体。语境从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上整合了一切主体与对象、理论与经验。显在与潜在的要素，并通过它们有序的结构决定了语境的整体意义。语境的实在性就体现在这些结构的现存性及其规定性之中，并通过这种结构的现实规定性展示它一切历史的、具体的动态功能。

不言而喻，语境绝不是万能的。语境论的研究仅仅是科学哲学迈向 21 世纪的趋向之一，但它已经并将以更崭新的姿态展示它迷人的光彩。

第一章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演变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一种新的“文化经验”，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后现代科学哲学是这种普遍的后现代运动中的某种渗透和映射的结果，有着自身独特的性质、形式和特征。后现代科学哲学是把科学哲学的发展放到整个后现代科学、文化和社会的大背景中去思考，从而更准确地把握科学哲学的某些时代的本质特征。

整体来讲，后现代科学哲学是在“转向”中演变和运动的，我们将之归结为“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它的发展渗透着后现代性研究方法的转换、趋向的调整及认识论基点的重新定位。本章先通过对“三大转向”形成动因、理论特征和方法论意义的系统分析，把握科学哲学 21 世纪发展的整体方向；然后具体到语言学、语义学、修辞学作更为详尽的探讨，深入并透彻了解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演变本质；最后简要谈谈“转向”中的新的融合点——心理意向的后现代重建，为科学哲学的建设提供新的界域和形式。

第一节 科学哲学在“转向”中运动

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正越来越突出地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一方面，科学的物质功能和应用价值直接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对世界的改造，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生存视界，有力地促进了人类从权力社会和财力社会逐渐地向智力社会的过渡；另一方面，科学自身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蕴在更为深远的层次上影响并决定了人类思维的发展和演进。后者对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是更为根本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因此，作为对科学进行哲学反思的科学哲学，它对于科学从哲学的乃至思想史和理论社会学的视角所进行的整体的、全方位的透视和探究便越显示出其时代意义和存在价值。

但是，从总体上讲，20 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呈现了一幅波澜起伏的历史图景。如何从浩繁的著作、众多的流派、陈杂的观点和激烈的论争中透视出科学哲学的发展路径，成为摆在科学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我们把科学哲学 20 世纪的

发展归结为在“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中的运动，正是试图以“三大转向”为基点和中枢，通过系统地分析其形成动因、理论特征和方法论意义，来具体地展示科学哲学思潮演化的历史进程、趋势定向和理性重建的模型及其各种特征，从而为把握科学哲学 21 世纪发展的方向和为建立科学哲学新的生长点提供合理的范式基础和可用的方法论手段。

一、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20 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作为哲学思维的一次根本性变革，使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研究的中心课题，它对传统哲学理性产生了强烈震撼并对后世哲学发生了决定性影响。

从总体上讲，语言转向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现代逻辑的产生。现代逻辑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具有了一种在哲学研究中对语言进行分析进而解决传统问题的科学的系统的方法。同时，这场革命性的运动，也是由哲学思维的内在发展和时代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相对论及量子力学的出现，使自然科学越来越远离经验发展。科学理论的构造、解释和评价问题便在科学哲学研究中愈来愈具有了突出的地位。因为哲学本质问题的争论，归根结底存在一个语言的表述和解释问题。在逻辑的自洽性与语言的规范性的一致性要求下，社会语言学向逻辑语言学发展，要求寻找它的应用层面。这样逻辑和语言与经验的统一性问题，即科学理性与经验的一致性问题，突出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因此，把所讨论的对象的本体论地位悬置起来，用统一的语言语词表达和重新解释，避免无益的争论，无疑是一种有利的、必要的策略。

“语言学转向”是一场在新的基点上探索哲学存在新方式的革命。其最直接的后果在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兴起，即把观察陈述视为构成整个科学理论的理性重建的逻辑起点，并试图在科学语言的逻辑统一的前提下，对科学理论进行经验主义的理性重建。为此它引入了新的语言分析，特别是语义分析的方法，开拓了哲学研究的新手段，进而在后现代的意义上进解了传统的对应论的本质论、符合论的真理论以及反映论的认识论。

但是，语言分析不是万能的。试图通过建构理想语言来解决所有哲学问题，既不是自明的，也不是必然的，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语言的主要功能在于实践，是人类的公共交往形式，只有把语言理解与解释经验、语言分析与语言使用相互渗透和融合，才能真正地发挥语言在哲学认识中的功用。同时，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使得非理性因素受到不应有的忽视，并对文化进行了消解，加剧了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的现代分裂，引致了科学主义与人文科学之间绝对的、僵化的界限形成和逐渐远离的局面。

无论如何，“语言学转向”带给 20 世纪科学哲学研究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启迪

性的和创造性的。尽管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必然地走向了衰落，但它的研究策略、方法、理论，仍长期地影响着科学哲学的发展。事实上，在它之后所产生的各种科学哲学流派，包括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科学实在论和逻辑实用主义，都是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对其正反不同的方面借鉴、批判而形成的。“语言学转向”的策略和逻辑经验主义的方法深深地渗入到了各种流派理论研究的方方面面之中。

二、科学哲学的“解释学转向”

“解释学转向”(interpretive turn)始于由库恩、海西和费耶阿本德等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家们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特别是反对根据科学主义的教条去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绝对划界的“实践运动”。它是解释与理解在方法论上的融合，即分析与解读的统一。这种语言理解与解释经验、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作为它形成的普遍化方式和整体途径，不仅突了解释学转向与语学转向之间的密切关联，而且是对后者的修正和超越，从实质上赋予了解释学以更强烈的解释实践的特征，从而满足了解释背景必须是科学、社会、文化与历史相统一的趋向，反映了心理意向解释重建的内在要求。

“解释学转向”所予以的时代特征一方面在于历史主义的整体进步。从本质上讲，科学理论的解释与解释学的文本理解从来就不是绝对地排斥的，而是在社会与文化的整体纽带中密切相连的。另一方面，“解释学转向”在更为广阔的时间序列和社会空间上影响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促进了科学实在论的全面复兴。

总之，“解释学转向”及所引发的解释学方法在整个认识论领域的全面扩张和渗透，使解释学方法脱离了狭隘的思辨域面进入了一个广阔的与社会历史相关的新视界，强化了解释学方法的整体性、相关性和一致性。这一发展，既促进了解释学在方法论上的多样性、本体性上的多元性和认识论上的深入性，同时也推进了整个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之间在方法论上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可能趋势；而解释学方法在科学哲学尤其是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表明，解释学方法的真正价值就在于通过实践理性的环节，通过自身方法论功能的充分展开，去创造实现社会理性的条件。可见，在具体的解释学方法的功能意义上，去达到和实现人类认识的必要条件，才能真正地推动社会理性的进步。

三、科学哲学的“修辞学转向”

“修辞学转向”(rhetorical turn)是一种在现代语言学、现代心理学和现代逻辑学的基础上，将古代传统的“劝说艺术”重建为一种全新的论证艺术的运动。它是